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

主编 高毅 陈丰

19 世纪和 20 世纪 之交的欧洲文化生活

LA VIE CULTURELLE EN
EUROPE AU TOURNANT
DES XIX^e ET XX^e SIÈCLES

[法] 雅克·杜加斯特 / 著

Jacques Dugast

黄艳红 / 译



*La Vie Culturelle
en Europe au
Tournant Des XIX^e
et XX^e Siècles*

K500.3/8

2007

会/文/化/史/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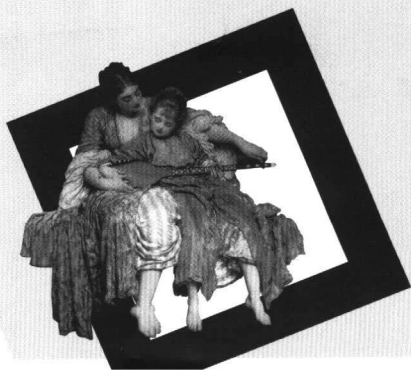
丰

19世纪和20世纪 之交的欧洲文化生活

[法] 雅克·杜加斯特 / 著
Jacques Dugast
黄艳红 / 译

LA VIE CULTURELLE EN
EUROPE AU TOURNANT
DES XIX^e ET XX^e SIÈCLES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生活 / (法) 杜加斯特著; 黄艳红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主编 高毅, 陈丰)
ISBN 978-7-300-08744-3

I. 19...

II. ①杜...②黄...

III. 文化生活-研究-欧洲-19 世纪~20 世纪

IV. K5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0687 号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

主编 高毅 陈丰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生活

[法] 雅克·杜加斯特 著

黄艳红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62515351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20.25 插页 2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07 00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序

人类历史的发展，世界文明的演进，动力何在？我们认为主要在于形形色色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的相互碰撞或交往。而自从有了整体的、真正的世界历史之后，人类社会林林总总的交往类型中最具关键意义的，大概就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往了。

所以作为东方人的我们，需要了解西方文化。对于我们来说，西方人或西方文化是“另类”，是“他者”，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可是何为“西方”？我们知道，这个概念不是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说到西方，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欧洲。当然，也有可能同时想到北美，想到澳洲。但那些地方曾经都是欧洲人的殖民地，是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社会，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社会的一种延伸，其文化老根还是在欧洲的。更何况后来还有大量的非欧洲人流入，再加上还有不少本土的原住民存在，以至于那些地方“世界民族杂居”的特点一直就比较突出，而且还在变得越来越突出。至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族群能否在这些地方真正组合成关系和睦的“世界民族大家庭”，并在此基础上为我们这个地球村打造出一个共同“世界文化”的样板，这事现在还说

不准，但这些地方的“西方”特性已远不如欧洲那样纯粹或典型，却是很显见的。所以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应该说只有欧洲这一块地方——而这个“欧洲”，常常还只能特指西欧：因为东欧，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在很多方面都和西欧有着本质的差别，很难扯到一起去。

事实上，“西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指的也就是欧洲，而且主要是西欧（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西方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就因为这里在18世纪和19世纪里突然发达起来了，发展出了一种本质上迥异于以往各个时代的“现代”型生活方式，并从此开始引领世界历史新潮流，滥觞了一场至今仍方兴未艾的世界现代化运动——当然这首先是一个“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其间发生过（而且至今还在经常发生）许多令广大“东方”民族难堪不平的事情。所以东方各民族要自立，要奋发图强，要彻底摆脱对于“西方”的从属状态，就必须深入了解西方，了解西方崛起的历史及其根本缘由。

简言之，欧洲既是西方文明的老根之所在，也是现代文明的老根之所在——这就是我们把目光锁定到欧洲（尤其是西欧）的主要理由之一。此外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欧洲这片土地现在有一种特别的重要性。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欧洲本身也因此惨遭蹂躏，几近万劫不复。但经过战后数十年的改革调整，欧洲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一体化程度极高、囊括了25个主权国家的超国家组织——欧洲联盟，从而有可能彻底告别其数千年战乱不断的历史。欧洲的这一变化，无疑能为人类解决有史以来一直



在困扰着自己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提供很多有益的启迪。不仅如此，作为世界之一极而又坚持多元民主原则的欧盟的出现，还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注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健康因素，让世界在抵制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保障和平发展乃至促进国际政治民主化等方面，增添了不少希望。现代欧洲何以能有如此作为？广大非欧洲的民族和国家应该怎样协调与欧洲的关系以推动一种健康的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这类问题也是时下人们不能不经常考虑到的，而我们编译这套书的目的之一，也就是希望能为这种思考做一点资料上的贡献。

接下来就该说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欧洲的“社会文化史”了。毋庸赘言，要了解西方或欧洲的文明，就不能不了解欧洲的历史，而了解欧洲历史的第一步工作，通常都是读欧洲人自己写的欧洲历史书——只有读到一定数量、悟出一定道理了，才能逐渐形成我们自己的独特观点和视角，然后才谈得上做我们自己的研究。可是，欧洲人写的欧洲史著作很多，为何要独重“社会文化史”这一个领域？这里主要有两个理由。

首先，“社会文化史”是当今欧洲史学最前沿的领域，也是最近二三十年来欧洲史学界最新潮的学问。我们知道欧洲人的欧洲史研究，至少从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以来就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风气常新，能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和流行的研究方法总是变动不居。这一情况当然并不难理解：史学潮流的变化速率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速率的反映。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顺应时代的史学创新实际上折射着史学界对社会进步的敏感，代表着史学界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重



新认识历史的努力，或者说是史学界在新形势下对历史内涵的一种带有现实关怀的刻意发掘，它既体现了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史学研究的一种发展或深化。显然，目前正盛行于欧洲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就具有这样的品质，因而是我们在今天译介欧洲人的欧洲史学作品时不能不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其次，“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内容，对于我们了解欧洲文明的本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价值。所谓“社会文化史”，其实也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依我所见它属于广义的文化史范畴，只是在论述中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之类与人类社会生活相关的因素有所侧重。既然是一种文化史，那它就可能比我们以往比较熟悉的欧洲的政治史或经济—社会史更能深刻地反映欧洲各民族的特性，因为按法国年鉴学派（该学派在 20 世纪的一大半时间里一直在引导着西方史学的主流）的著名理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传统的惰性领域，它具有抗拒变化的特征，演变速率极为缓慢，但也正因如此，它能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起到极为深沉有力的制约作用。严格说来，这种“社会文化史”也并不是今天的欧洲人发明的，实际上它非常古老，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欧洲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那里，在他的那部《历史》中就能找到不少社会文化史的成分。在后来欧洲历史编纂学的流变历程中，也一直并存着文化史和政治史这两股大的传统，而文化史那一脉还曾在 18 世纪经由伏尔泰的史学实践大大地风光过一阵。只是随着 19 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的勃兴，偏重阐释的文化史学才跌入低谷，出现了偏重史实叙述的政治史学叱咤史

坛的局面。不过时过不久，到20世纪初叶就发生了“新史学”对所谓实证主义“传统史学”的反叛，政治史趋于衰落，一种包括文化史在内的总体史开始复兴。但在20世纪中期，“新史学”由于片面注重物质层面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不仅完全排斥政治史，而且还出现了忽视文化史的倾向，逐渐走入“见物不见人”的死胡同，结果又引起了一场新的“反叛”，由此既促成了政治史、叙述史的复归，也唤起了对文化史的重新关注。然而，由于这场造反运动是在以年鉴学派为先导的西方史学主流内部发生的，而且很多造反者本身就是年鉴派的核心成员，他们反对的只是领袖布罗代尔的上述那种“物化”历史的片面倾向，而无意于触动该学派关于历史时间可以划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以及长时段因素具有最终决定意义这些根本信念，故而他们所倡导的政治史或叙述史以及文化史都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也就是都有意识地把不同时段的因素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都很注意分析各时段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这个时候的政治史和文化史其实都是“新”的：从政治史方面来说，由于掺入了对各种长时段的、而且主要是文化的因素的考量，结果兴起的实际上是一种崭新的“政治文化史学”；而从文化史方面来看，由于和短时段因素相关的“叙述史”兴趣的复兴，以往长期被忽视的人物活动以及与此密切相连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交往活动，也都进入了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于是便有了我们现在正在关注的这股“社会文化史学”的新潮流。

由此看来，我们这套译丛的推出不仅有可能增进国内读书界对西方文化的深层次了解，同时还有可能为我国的欧洲



史研究——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甚至包括所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提供特别的助力。

当然这还仅仅只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深知，要做好这样一个开放性的译丛，绝非易事。首先，要获得足够多和足够好的选题，就绝不是仅靠一两个编者就能做到的。因此，我们诚恳期望所有关心这套丛书的读者朋友都能来参与她的建设，企盼你们积极提供西方出版界相关的好书讯息，并随时提出你们的宝贵批评与建议——让这套丛书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高毅

写于北京八大处

目 录

导 言	(1)
1. 1900 年欧洲的文化地理	(10)
“场地条件”	(10)
技术变革及其文化冲击	(13)
色彩斑驳的文化图像	(20)
文化圣地	(22)
新的文化生活中中心	(27)
北欧各国的文化生活	(32)
南欧半岛	(39)
1890—1910 年之间欧洲各文化生活中的	
文学形象	(45)
2. 国际文化交往	(57)
法国与日耳曼世界之间的交往	(58)
英国和欧洲	(71)
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	(78)
俄国和欧洲	(81)
中欧的文化交往及各民族形象	(84)
德国人和俄国人	(84)
日耳曼人和捷克人	(87)



法国人和意大利人	(88)
比利时—奥地利轴心	(89)
维也纳,“文化共同体”(奥斯卡·柯柯什卡)	(91)
巴黎在欧洲的声誉	(93)
杂志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	(101)
3. 新的文化行为	(105)
新的娱乐方式	(105)
咖啡馆文化	(105)
酒馆、带歌舞表演的咖啡馆、杂耍歌舞场	(111)
街头表演和游乐园	(121)
当体育成为表演时	(124)
旅行	(128)
一种新的文化传播形式:大型展览会	(129)
风靡一时的轻歌剧	(135)
时尚的艺术	(138)
印刷品的出版和传播	(143)
青少年读物	(147)
新杂志	(148)
4. 追求统一性	(155)
走向文化共同体	(155)
边界的消失	(158)
艺术家的村落	(163)
各类艺术表现形式之界限的消失	(165)
次要艺术地位的上升	(168)
欧洲的音乐文化:一种跨国的统一语言	(174)



5. 文化病态	(183)
文化教育问题	(183)
语言问题	(188)
悲哀和惶恐	(193)
艺术表现的危机	(209)
神秘主义	(214)
无政府主义思潮	(217)
反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	(220)
鄙视妇女和女权主义	(227)
6. 新的语言, 新的视野	(236)
摄影	(236)
电影	(238)
欧洲和世界其他文化	(243)
东方文化	(245)
美洲	(253)
“原始艺术”	(257)
人名索引	(265)
译后记	(309)



导 言

1

我们准备在这本书中考察一个历史时期内欧洲文化的各个方面，在今天，这个历史时期通常被称作“世纪之交”。这个说法，像“世纪末”一样，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为很多欧洲艺术家采用，但在人们可能给它指定的年代界限方面，它显然缺少精确性。另一方面，它可能迎合某种天真的历史数字命理说，不过1900年和2000年本身并不构成一件大事，更不是一个人类生活的历程猝然转变和重新定向的轴心。

如果人们要弄清楚这样一个年代的起止界限（*terminus a quo, terminus ad quem*），这就必然要再度面临历史学家们从各自的视角出发而形成的不同选择。如果主要以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为核心观点，有人可以把这一转折时代的跨度定为43年或44年，即从1870年的普法战争（或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诞生）到1914年7月法国和德国宣战。如果不那么强调军事史领域，则可以从社会事实，或更准确地说，从文化事实出发，确定另一些年代标记。比如，1886年3月《费加罗报》发表象征派宣言、1888年纳比派^①的第一次画展、

① 这是个青年画家团体，在艺术上受日本浮世绘、法国象征主义绘画和英国拉斐尔前派的影响很大，对19世纪后期法国艺术的各方面都产生过实际影响，并为20世纪初抽象主义和非具象艺术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纳比（Nabi）这个词来源于希伯来语，为“先知”的意思。——译者注

1889 年巴黎的万国博览会、1890 年格伦施泰尔咖啡馆的“维也纳青年”聚会、1896 年在慕尼黑创办的《青年》杂志、同年在匈牙利举行的千年庆典——无疑还有很多其他事件——也可以看成某种“转折”的征象。

作为一个断裂的标记，1914 年明显更具合理性，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振荡对欧洲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造成了反响。不过在今天，人们倾向于认为，许多被我们视为典型的“两次大战之间”（1918—1939 年）的思想和美学运动，其实在 1914 年之前就已经成型：某种意义上说，1910—1915 年之间的表现主义和未来主义是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先声。现代人对于教育、妇女地位、大众文化等问题的疑惑，“新艺术”的美学创新，抽象艺术和立体主义的诞生，这些都见证了 1890—1900 年间反抗战争暴力的新趋向。另一方面，人们普遍以现代性这一观念来强调连续效应，而目前的后现代概念又加强了对于 1880—1945 年间艺术方面具有历史同质性的看法。

因此，试图去论证“世纪之交”严格的年代界限似乎是徒劳的。在这里，这一说法将只是作为某种方便的语言隐喻加以运用。对于我们即将涉及的欧洲历史上的这一时代，还有其他同样模糊的叫法：“美好时代”、“1900 年的一代”（若涉及西班牙则为 1898 年的一代？）。我们知道，对这些说法也应持保留意见：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这个时代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美好，当时文化生活的某些基本特征到 1900 年时就已经消失了……

“昨日的世界”，这是生于 1881 年的斯特凡·茨威格给他

的回忆录和个人感想所起的名称，这些感想是他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到二次大战前夕各个社会的回忆所引发的思考。^① 这部著作并不拘泥于年代界限，而是强调文化和文明的变迁，它在卷首题记中引述了莎士比亚的一段话，这段引言以“人类状况”之转折的根本特征为依据：

让我们面对这个时代，

既然它已来临并在转变。

（莎士比亚，《辛白林》）

确实，任何时代都是过渡性的，不管有没有世纪的交替；这些过渡则因时机不同而或快或慢，由此带来的痛苦程度也不尽一致。各个时代的人，有的想推动转变，别人则是被动地忍受它们。

这里的“文化生活”一说是从其最宽泛的词义上加以运用的。我们打算局限于文化概念通常所指的作品和约定俗成的制度上。根据当代人类学的研究，本书认为，作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特征的文化实践，远远超出了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文学领域。后一领域的产品有时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它们也依赖于——其依赖性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多——经济条件、技术的发展和组织社会生活的思想体系所创设的交往方式。在这方面，我们将要考察的时代特别具有代表性，因为它在一个十分短促的时期内汇聚了一些决定性的变迁。生产形式、闲暇时间的分配、指导教育和个人修养的原则几

^① See Stefan Zweig, *Die Welt von gestern, Erinnerungen eines Europäers* (Le Monde d'hier, souvenirs d'un Européen), Paris, Belfond, 1993.

乎到处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诱发了新的文化行为。

本书的重点是，以一种特别的横截面的视角，考察与那些极端迅猛的骚动相关的变迁，这些骚动乃是今日被称为欧洲的各成员国的社会生活的特征。这些现象之间并不总是存在紧密联系，但人们可以看到国际文化交往呈惊人的加速趋势（各国艺术家、作家、知识分子之间的直接接触，以出版、展览等渠道进行的交流）。同样，人们还发现，为数众多的欧洲人的居住、劳动、娱乐方式发生了有时堪称惊人的变化。
4 这些变化发生在最多 20 年的时间内，根据观察对象的不同，我们可以把这 20 年定在 1880—1900 或 1890—1910 年间。

与人们通常对艺术作品和文学的考察方式相比，我们的思考将更为明确地置于某种社会史的背景下。今天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中日益注重他们所探讨的时代的文化。在法国，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了一些专攻我们所关注的时代的文化史的研究著作，特别是克里斯托弗·普罗沙松、克里斯托弗·夏尔、阿兰·科尔班、勒内·雷蒙的研究，它们在很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对于法国社会的相关问题的可贵分析。我们将试图把这些考察扩展到欧洲范围，因为当时文化领域内的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个整个大陆性的层面上发生的。近十年来，有关欧洲史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它们并没有忽视文化生活，但在我们看来，它们仍过于关注文化生活的外在方面。它们有关这方面的论述，经常像是更为专业的历史表述（经济、人口、外交和军事等事实）的一种了却义务式的补充。

很显然，世纪之交的文化欧洲是一个复杂的、根本上说

是性质各异的研究对象。各国文化的既有状况是各种不同传统的载体。这些传统体现在众多的语言和制度形式中，而各种制度形式本身又因为欧洲大陆各地区的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现存权威和艺术家们之间的关系而十分不同。问题不是要抹杀这些差异来构建一个异想天开的欧洲统一性的表象，我们不能忘记当时欧洲各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紧张和冲突。先前的历史演变（如 1866 年奥地利人在萨多瓦对普鲁士人时的溃败，或第三共和国的法国人的色当^①）在公共舆论中累积下来的怨恨情绪，哈布斯堡各民族之间紧张的历史关系，以及很多其他更为古老，但有时已被遗忘的旧仇夙怨，所有这些都仍在滋养着消极的、可能阻碍文化交流的旧模式。不可否认，这个时代也是民族主义更为猛烈地蔓延的 5 时代，是产生反犹主义理论的时代，是仇外情绪被现代煽动家们提升为政治原则的时代。这些不和谐的因素必定要在 1914 年夏天的危机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不过，如果人们愿意去理解这个年代的文化创作的某些方面的话，那么，与上述分裂和异质化的因素相对立的是，当时还存在某些超越国界和民族隔阂、趋向于使文化生活同质化的状况，强调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不打算对这些进程作出价值判断，而是侧重于指出：在我们上述的紧张关系和更为确切意义上的文化交往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和系统的对应关系。

^① 色当是法国东北部的要塞，1870 年 9 月，法军在这里遭受惨败，原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成为普鲁士军队的阶下囚。——译者注